

近代文學研究的先導與拓殖

——評王爾敏《中國近代文運之升降》

● 馮仰操



王爾敏：《中國近代文運之升降》
(北京：中華書局，2011)。

王爾敏先生以歷史學家身份兼治近代文學史，自1980年代初迄今已有三十年^①，其文章多散見於海外雜誌，幸有《中國近代文運之升降》(以下簡稱《近代文運》，引用只

註頁碼)一書彙總，使中國大陸讀者可以窺其一斑。書中各文雖寫於不同年代，其論域與關懷卻基本一致，以知識普及化為焦點論近代文運變遷，集中於晚清並詳細辨明此期間變化的根本動力以及先驅者的貢獻，創見良多。在近代文學研究史上，應承認王爾敏此類研究的先驅位置，本文嘗試探討其研究理路並提出若干批評。

一 問題之探討

《近代文運》收入十三篇文章，九篇討論近代文學，主體理論框架始終如一，即將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視為近代文學鉅變之起點，蓋此時知識份子因時代危機而產生喚醒國民的迫切願望，在此動力推動下，開始種種知識普及化運動，近代文學隨之而興^②。王爾敏列舉了晚清知識普及化運動的三種途徑，即平民教育、改良簡化文

書中各文雖寫於不同年代，其論域與關懷卻基本一致，以知識普及化為焦點論近代文運變遷，集中於晚清並詳細辨明此期間變化的根本動力以及先驅者的貢獻，創見良多。

王爾敏啟示我們採取整體觀研究二十世紀文學，但其方法論未免過於機械。文學誠然反映時代思潮，但卻並非照相式的，而是有其獨特的運行規律，將之單純作為思想史材料無疑有偏頗之處。

字、推廣通俗文學，並着力於研究後二者。改良文字或推廣通俗文學均為晚清至民國文學的焦點，圍繞此二者的爭論與實踐從未間斷。王爾敏聚焦於清末，探討此類現象原初的狀態，具體問題如下：

其一，通俗文學之興起。王爾敏所謂「通俗文學」，實指傳統詩文主流之外的小說等邊緣文學，其〈中國近代知識普及運動與通俗文學之興起〉(1983)一文，從清末文學理論倡導與文學實踐方面論證其興起的根本動力：

由危機意識促使喚醒全國國民之醒覺運動；由喚醒國民之需要，而促使知識普及化運動，由知識普及化之需要而使通俗文學一種表達工具之得以發展。此為晚清通俗文學興盛之基本動力。(頁74)

這一研究的理論貢獻是打破文學史分期的藩籬，確認現代文學自身的運動「既不起自『五四』，又非收成於『五四』」(〈通論〉，頁21)。新文學的緣起誠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此問題長期因政治因素導致爭議紛紛，但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將新文學溯源至晚清在中國大陸學界已成共識。王爾敏於1980年代初已於此領域鄭重發文，指出文學史家討論現代文學僅溯源至《新青年》，乃忽略其形成之時代背景與種種因素之激蕩融和。他認為新文學同樣承受近代文學興起的根本動力，因此以1895年為文學鉅變的起點，討論範圍下至1930年代。該文學史思路在中國大陸學者陳平原等人醞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框架之前提出，其先驅性當無可置疑^③。

在知識普及化的思想框架下，新文學誕生初期如平民文學、通俗文學等大量思想話題均可溯源至清末通俗文學思潮，王爾敏僅指出這一點，惜未展開深入探討。事實上，知識普及化思想不僅影響早期的新文學，甚至1930年代左翼文學、1940年代解放區文學圍繞文學大眾化的主流論爭均承此餘緒^④。此外，王爾敏指出，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研究的開創也正是中國近代通俗文學影響之重大結果。俗文學、民俗學的開創者多為新文學家，如奠基者周作人、劉半農、鍾敬文、鄭振鐸等，關於民間文學思潮的專門研究多已問世，其中顯著者為洪長泰於1985年出版的《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民間文學運動》(*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一書，但此書卻未探索民間文學運動的清末思想淵源，正反映了王爾敏的先見卓識^⑤。

王爾敏啟示我們採取整體觀研究二十世紀文學，並警示文學史家「惟實往往專心致志於文學本身內涵，未甚留心中國遭遇外來衝擊在外交、在戰爭、在商貿、在傳教等等細節」(頁213)之不足，但其方法論未免過於機械，將文學作為思想史材料，如論「重點不在於文學之藝術成就，價值高下，實在於其所表達之思想」(頁2)。文學誠然反映時代思潮，但卻並非照相式的，而是有其獨特的運行規律，將之單純作為思想史材料無疑有偏頗之處。

清末民初文學研究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逐漸成為顯學，眾多文學史家投身其中，其研究路數着重從文學內部理路入手，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成績突出的有陳平原、王德威、韓南 (Patrick Hanan) 等，均利用敘事學、文體學、現代性等西方理論資源進入晚清文學內部，發掘該時期文學的轉型或原創性^⑥。

其二，國語運動之發生。文學與語言文字問題密切相關，對中國語言發展方向的摸索自清末開始已近百年，迄今尚眾說紛紜，而早期史料梳理多為語言學家用力在先，如羅常培《國音字母演進史》(1934)、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1934)、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1948)等。《近代文運》收錄王爾敏的〈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之自覺及國語運動〉(1982)一文，不再重複探討語文本身的問題，而着力討論國語運動之思想背景，其結論仍是將之歸結為知識普及化思潮的影響。其中，王爾敏對國語運動的主流方案(即國語羅馬字改革方案)提出嚴肅反省，現在看來似乎無甚高論，但其文發表時間遠在此問題成為當下文史學界熱點之前。

王爾敏對國語運動史料做了深入清理，卻並未解答國語運動與近代文學關係之關鍵問題。今日中國大陸學界對文學與語言問題關注者日眾，然多未結合清末以來文字改革思潮加以探討，但有少數突出者如王風等對民國後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的關係進行了梳理，填補了王爾敏留下的空白^⑦。今日看來，國

語運動之成果為白話文、簡體字和漢語拼音，其價值如何未有定論，其與文學之關係這一近現代文學關鍵問題仍需學界着力解答。

其三，清末諸文體研究。底層文化研究素為王爾敏所關注，已有《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等多種著作結集出版^⑧，通俗文學研究亦是題中之義。竹枝詞、公案小說、香豔著作等文體雖前代多有討論，但王爾敏所論均結合具體歷史背景而有前人未見之處。向來的文學史家多重從形式方面研究文體，實際上文體變化與歷史背景之間有複雜的互動關係，王爾敏作為史家，其務實的研究恰能揭示這一點^⑨。

例如，書中所收的〈清人海外詩草及竹枝詞對於歐西之採風〉(2009)一文，研究路數是詩史互證，以晚清文人遊歷海外時所撰的詩詞為材料，從中看出竹枝詞這一體裁進入域外這一新環境後吸取新題材並開拓領域，其生命力卓然可見。王爾敏還指出從晚清《申報》至當今港台報紙都刊有竹枝詞，這提示我們傳統詩詞雖自新文學出現以來不斷衰落，卻並未完全喪失活力，尤其是民國詩詞，學界迄今仍未作出整體梳理與重估。

又如，王爾敏的〈清代公案小說之撰著風格〉(1993)，以清代公案小說為對象探討其風格之發展：

公案小說主角，已由清官移向下級三班、捕快、皂隸以及清官身邊的僕從。……清代公案小說，精彩部分全在江湖上黑白兩道的對決，他

王爾敏指出從晚清《申報》至當今港台報紙都刊有竹枝詞，這提示我們傳統詩詞雖自新文學出現以來不斷衰落，卻並未完全喪失活力，尤其是民國詩詞，學界迄今仍未作出整體梳理與重估。

們彼此相通，在清代本是常態，他們原避免結怨，最後不得不兵器相見。……它的身價，由其所擁有的讀者任意看待。若一定要統一於文學之下，那也是一種專制。……民國20年代，文學界把公案小說看成是同於西方的偵探小說。真是洋學究的一種洋附會。其實二者之間絕無相似，風馬牛不相及。(頁324-25)

該論斷明察清代歷史背景與公案小說人物、情節變遷之間的關聯，從而從體裁淵源上分清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的界限，拒絕了後來文學界的洋附會。

此外，王爾敏對王韜素有研究，著有〈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遊〉、〈王韜課士及其新思潮之啟發〉等文章^⑩，而書中收入的〈王韜風流至性〉(1994)一文，專以王韜的風流行徑為焦點，將之視為轉型時代的文士典型看待，不存輕視之心，着力於發掘其一生風流事業。尤值得今人重視者，該文指出王韜所著的《花國劇談》、《海陬冶遊錄》等為妓女生活寫照，為近代文學平民化開風氣之先。王韜除自撰新作外，更搜集前代淫書彙為《豔史叢鈔》，被稱為「代表19世紀香豔書籍出版推廣與著作之巨擘，雖非獨佔，實為大宗」(頁366)。王爾敏尚呼籲：

王韜風流豔史，罄竹難書。其情書談豔，閨閣詩，悼亡詩，遊戲風月詩，品評名姬詩，多難舉其百一，本文無法容納。相信海內學者必有嗜痂者願一檢視，若加研考，亦足可完成巨構，補充文史。(頁367)

此種搜集偏門史料之決心與魄力值得後學效仿。

其四，西方人的先驅貢獻。近代文學的興起與通商口岸的開放關係密切，王爾敏圍繞英人美查兄弟(Frederick and Ernest Major)所開創之新聞事業與近代文學的關係進行專門研究。美查兄弟在華開創《申報》社、申昌書局、點石齋印書館，三種機構均對中國近代文化發揮巨大作用。如1872年創立的《申報》為影響晚清之最重要報紙，一開始便刊布竹枝詞，《申報》社並承印通俗文學書籍，及至申昌書局、點石齋印書館成立，更全面印售中文書籍，其中包括大量通俗文獻，為近代文學興起提供堅實平台。此外，附屬《申報》之《點石齋畫報》(1884年創刊)為晚清早期之畫報，對民間通俗化知識之流布貢獻頗大。王爾敏辛苦爬梳之結果可參見書中收錄的〈英人美查兄弟與中國口岸通俗文學之生機〉(2009)、〈口岸流風與小說文運之興起〉(2009)、〈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以《點石齋畫報》為例〉(1990)，以及〈《點石齋畫報》所展現之近代歷史脈絡〉(2000)等文。

尚有一點需要指出，王爾敏在〈中國近代知識普及運動與通俗文學之興起〉一文肯定了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對近代文學之開創意義。傅蘭雅早在1895年《萬國公報》上便公開刊登徵文啟事，徵求「時新小說」。談近代新小說者往往遺漏傅蘭雅，而為王爾敏最先拈出^⑪。

書中尚有四篇文章，是對陳寅恪、周策縱、劉若愚、劉殿爵等前

王爾敏肯定了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對近代文學之開創意義。傅蘭雅早在1895年《萬國公報》上便公開刊登徵文啟事，徵求「時新小說」。談近代新小說者往往遺漏傅蘭雅，而為王爾敏最先拈出。

輩大師的書評或悼文，充分體現王爾敏之學術志趣與人生態度，本文不一一介紹。

二 尚未解答之問題

王爾敏在探討近代文學、語文起源時，均承認其始於嚴肅之反省，源於正當之需要，但同時又對之抱尖銳批判。此種表現同樣有其思想史預設，王爾敏多次指出中國人喪失民族自信心，是起於1900年八國聯軍打入北京，並簽訂不平等條約，其結果是「20世紀以降，國人軟媚成風，連學者教授、文壇健將，也俱崇洋畏洋，回首自侮本國祖先所遺，固有文化一概鄙棄不顧，則以效法西洋為時髦」（〈自序〉，頁9）。當他探討近代文學時，對五四新文學、國語羅馬字方案均持懷疑乃至批判態度，如對新文學的態度在〈自序〉中已經顯露：

固有之文學藝術，亦不要繼承，可另創新文學，開出一條新路。其實非新開創也，乃是模擬西方文學之路，重要信持，是委之於Literature所約制之規範，從事寫作，大不同於固舊，則依西方之流變而隨之起伏高下。（〈自序〉，頁10）

王爾敏探討五四新文學時，指出其中一個弊病是以西方文學為旨歸，尤其對周作人多有嚴苛之語，如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輸入西方人道主義思想，被王爾敏視為抹殺傳統思想，「喪心無知，自視輕賤之甚」（頁58）。此外，王爾敏探討國

語運動，對當時取消漢字、採納「世界語」的方案大加質疑，認為其正反映「國人民族自信之崩潰」（頁121）。王爾敏此類主張均有其洞察之處，新文學的進程與西方文學的輸入緊密聯繫，以致西方文學制度成為新文學制度的模板，如用日本學者柄谷行人的說法，即是現代人的認識裝置已經發生了顛倒，不再從傳統而是從西方的視角看待文學^②。

但是，新文學是否僅僅被動地承受西方的衝擊，這卻是一個有待審視的問題。筆者試圖指出王爾敏的思想史淵源，並對此預設做出一番評判。

王爾敏拒絕全盤西化並主張保存與發揚固有文化，此言論有其思想史淵源。作為史家，他獨立不羈，常追溯其學術傳統，《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為其代表作。該書雖着力樹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南港學派」旗幟，但不忘追溯「國粹學派」、「學衡派」、「戰國策學派」等非主流史學流派，並尊重傳統史學的開創規模與輝煌遺產，宗仰「20世紀以前的歷代史家風範與志節」^③。其史學皈依傳統，在文學上亦是如此。

本文僅就《近代文運》一書所提及的前輩學者中尋求線索，如王爾敏在〈自序〉中讚賞抗日戰爭期間「若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仍能維護中國文化，批斥西方文學、哲學、史學」（〈自序〉，頁2）；該書褒獎錢基博、阿英，「研治文學史，自不需要創新獨造的才華縱橫，卻必須具有博通古今當代之文學修養，尤其須不居於任何思想流派之偏，眼光要遠大，志識要博通，立

王爾敏對五四新文學、國語羅馬字方案均持懷疑乃至批判態度。新文學的進程與西方文學的輸入緊密聯繫，但是新文學是否僅僅被動地承受西方的衝擊，這卻是一個有待審視的問題。

從學衡派到王爾敏，均主張中西交匯。但中國文化的進程問題並非上述非主流一脈所有，實為貫穿中國二十世紀各家各派始終的問題，其紛繁複雜絕非一人一時代可解決。

旨要平正，特別是要有心發掘一代沉埋之好文學作品，搜考一代亡佚之文獻。如此方可撰成公正全備之文學史。我想阿英與錢基博應該是我國治文學史者之典範代表」（頁260）；又信奉陳寅恪所言「破壞易而建設難，無其道而行其事」，影射「民初以來前進學者不負責任之瘋狂大破壞」（頁375）。

王爾敏推崇上述學者的共同點都指向對傳統文化的整理與維護。阿英本身為新文學家，但治近代文學用功頗深。其他如錢基博為古文研究大家，曾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以展示清末民初「現代文人之懺悔錄」，抨擊當時文化鉅子日趨於西化。陳寅恪為史學大家，其〈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在1930年代白話盛行的背景下尚且暗示中國文學應以文言為正宗^⑨。此外，陳寅恪、陳銓均曾為與胡適對壘之《學衡》雜誌撰稿，陳銓亦為後來的戰國策學派主將，《學衡》在思想主張上均與當時新文學主流唱對台戲，直至1930年代尚且僅刊登古詩文，對過於激進之文化文學主潮無疑有糾偏之功。可見，王爾敏所推舉的也多為非主流一脈，他的思想史淵源其來有自。

非主流一脈的文化主張均為中西古今的交融，如《學衡》第一期便揭示其宗旨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⑩；又如陳寅恪主張「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⑪等。王爾敏的主張並未脫其藩籬，如在書中提問：「我國文學究竟是仍跟着西方走下去？還是在其中創出一條

新路？或是再重估中國固有之文學傳承接續下去？」（〈通論〉，頁18）同時為中國文學前途提出一種途徑，即「另行開闢循中國固有文學規制，探索而恢復繼承舊文學之寫作，一定要脫去Literature之洋式規矩與戒律。二者並行，才是中國文學開展之路」（〈自序〉，頁10-11）。

從學衡派到王爾敏，均主張中西交匯。但中國文化的進程問題並非上述非主流一脈所有，實為貫穿中國二十世紀各家各派始終的問題，其紛繁複雜絕非一人一時代可解決。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史學或文學均有所謂主流或非主流，科學主義史學、馬列主義史學為史學界主流，新文學則為文學界主流，雖為主流卻不無偏頗。以陳寅恪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一脈在很長時間內被擱置不顧，近幾十年來卻成為學界熱點，正反映當代對近百年文化思潮的再反思。但筆者認為，無論是歷史上的文化守成者還是當代的文化反思者，也均有偏頗之處，即僅有一種理想主張卻缺乏具體可行的實踐方案。文化或文學為實踐中的產物，而文化守成者並未對實踐中之中西融和做出深入探索，學衡派、戰國策學派的學術貢獻可圈可點，但文學實績乏善可陳，尤其前者因固守傳統而排斥新文學，守成有餘而創新不足，因白話盛行而使得古詩文創作更趨小眾，後繼乏人。

反觀王爾敏對新文學的評判，也不無偏頗。王爾敏認為新文學罔顧傳統，但就文學實績言，新文學陣營在古今融和方面做出了最有成效之探索。其開創之初無疑過於激

進，但胡適或錢玄同等人的激進言論迅速為後來的溫和主張取代，之後文學發展不期然走向古今交融之路。要駁倒王爾敏的觀點，必須對新文學各家各派作詳盡的考察，本文力所不逮，僅從大致方向而論，如新詩、散文等並未割裂傳統，而是在承受傳統詩文影響的基礎上走向中西融和，如現代散文的奠基者周作人最早提出效仿英法“essay”的「美文」主張，不久就從晚明小品中發掘到現代散文的傳統資源，後為林語堂等跟進；又如1930年代廢名、卞之琳、林庚等現代派詩人承受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同時追溯晚唐詩詞，尋求二者的相似處。

新文學的發展歷程風雲變幻，民國文學整體蘊含無限活力與可能，並未走向單一之途。王爾敏談及1920年代「革命文學」時感嘆「所謂『新文學者』，終於淪為宣傳之工具」（頁71），此並未揭示文學全貌，當時與革命文學乃至後來左翼文學對壘者頗眾，如文學史家命名的「京派」、「海派」等，均各持己見，為新文學的多元探索作出貢獻。

當我們審視王爾敏的思想預設時，不能不指出其洞見與不見的共存。他籠統地指出二十世紀知識份子自信心喪失，導致傳統文化淪喪，此預設凸顯現代中國面對西方衝擊時是無力應對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知識份子並非純粹消極地面對西方文化，晚清知識普及化運動無疑是積極的，及至民國也並未完全頹敗，因此王爾敏厚晚清而薄民國不免顯得偏頗。這一預設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取向的偏頗，因其將文學的進程單純歸於思想文化

的因素，無助於對歷史進行動態探索^①。

本文也認為單一的思想文化研究不能抵達歷史的深處，因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不能僅從思想文化上看，而應考慮更為複雜的社會政治環境。新文學內部有種種分歧，從時間上看，新中國建立前後兩期文學呈現極大的異質性。僅從文學資源來看，民國時新文學有多種資源可供吸取，且大部分新文學家多為貫通中西者。及至新中國建立，承續延安文學一脈者佔據主流，文學至此全為政治裹脅，文學資源不僅與傳統隔斷，甚至與西方也大致隔絕，僅有蘇聯文學輸入。

新文學的功過是非，以及與傳統文學、西方文學之間的繼承與變革，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均需要極為深入的探討，絕非三言兩語可以概括。王爾敏從其思想史預設出發給了一個判斷，但我們並不止步於此，而試圖從細節與源流入手，詳細考察新文學在哪些方面和何種程度上進行了獨特的創造，以期為正在進行中的文學提供參考與借鑒。

王爾敏談及1920年代「革命文學」時感嘆「所謂『新文學者』，終於淪為宣傳之工具」，此並未揭示文學全貌，當時與革命文學乃至後來左翼文學對壘者頗眾，均為新文學的多元探索作出貢獻。

註釋

① 若追溯其治近代文學史的緣起，可上推至〈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1970）一文，該文提出若干思想問題，其中有「晚清通俗文學對於新思潮傳播的功能」議題。參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47。

② 該框架源自王爾敏的思想史研究，他在〈清季知識份子的自覺〉（1971）一文已指出清季知識份

子普遍醒覺，開始投身於喚醒全國同胞之種種運動。參見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80-139。

③ 參見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27-38。

④ 李孝悌指出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為了啟蒙與救亡，開始關注小傳統如民間文化，民間文化成為知識普及化的焦點。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91-96。另外，對1930年代以後民間文化的集中探討，參見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

⑤ 洪長泰在追溯民間文學運動興起的元素時，僅提及民族主義思潮、外來影響與馮夢龍等古代先驅，卻對清末的思想淵源不置一詞。參見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頁27-52。

⑥ 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韓南（Patrick Hanan）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等。

⑦ 參見王風：〈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載夏曉虹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46-70；王楓：〈新文學的建立與現代書面語的產生〉（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0），未刊稿。

⑧ 參見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⑨ 近年來的文體研究便體現出對文體背後的制度因素的偏重，將文體放入擴大的文學與社會背景中來探討。參見張麗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為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⑩ 參見王爾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⑪ 有關傅蘭雅推動近代文學的貢獻，參見潘建國：〈小說徵文與晚清小說觀念的演進〉，《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頁86-94；韓南：〈新小說前的新小說——傅蘭雅的小說競賽〉，載《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頁128-47。

⑫ 參見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1-34。

⑬ 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紀念朱雲影先生逝世六周年之講演〉，載《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

⑭ 桑兵：〈文與言的分與合——重估五四時期的白話文〉，《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0期，頁86-88。

⑮ 參見〈學衡雜誌簡章〉，《學衡》，1922年第1期。

⑯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84-85。

⑰ 這裏可以借鑒柯文的觀點，他在批評「衝擊—回應」與「傳統—近代」等思想模式時，指出這些模式多以社會文化對比為中心概念而建立起來，容易對歷史採取相對靜止的看法，無法顧及某一文化內部在時間上所經歷的變異。參見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03-205。